

因为有了他的创作,中国戏剧才有了真正与世界最优秀的现代戏剧对话的空间,也因为有了他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《北京人》等作品横空出世,中国话剧舞台才有了如此精彩的表演,一代又一代观众可以享受话剧艺术的美感。

曹禺先生的艺术创造力和社会影响力穿越了时光岁月,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,直至今天都让人难以忘怀。

1996年12月13日,曹禺先生在北京逝世,享年86岁。思怀曹禺先生,谨以此文向这位戏剧大师致敬。

一生关注思考人的问题, 话剧创作来自生命体验

如何概括曹禺先生的戏剧艺术特色呢?曹禺先生在晚年访谈中,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,谈及自己十七八岁时的思想状况,认为自己考虑最多的问题是“人活着是什么”。这一玄思玄想,将他的创作注意力引向了对人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。

在文学史上,并不是所有创作者都对人的问题感兴趣。有的作家对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感兴趣,而有的则对风土人情、地方文化感兴趣,但曹禺先生明确而坚定地认为自己对人的问题最感兴趣。这种兴趣首先来自他童年家庭生活的影响。

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,回国后曾一度担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,但他对军旅生活没有兴趣,很早就退守到天津做寓公了。在曹禺的印象中,父亲“胆子很小,没有打过仗。他念书很多,倒是个地道的文人,是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。四十几岁时就经常找几个文人,在一起吃吃喝喝,或赋诗,或写对联,或抽大烟,或发牢骚,一副潦倒落魄的样子”。

曹禺的父亲先后娶过三任妻子,曹禺是第二任妻子所生,可惜的是曹禺生下来第三天,母亲就得了产褥热病逝了,他是第三任太太——他母亲的妹妹带大的。曹禺对家庭的印象,是简单,但“十分别扭,我不喜欢我家。”“家中的空气非常不调和。从早到晚,父亲和继母在一起抽鸦片烟。我记事的时候,父亲就不做事了。上中学时,我每天早晨去上学,下午4点回家,这时父亲继母还都在睡觉。抽一夜鸦片,天亮才睡觉,下午四五点钟才起来。我回家后,家里鸦雀无声。其实家里人不少,厨子一个,帮厨的一个,拉洋车的一个,还有一个佣人,一个保姆。但是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,十分可怕。”“就是这么一个沉闷的家庭,却给了我一个好处,使我专心读书。因为,我不想看见那些令人心烦的事,就躲到自己的房子里去读书。”

曹禺小时候似乎不是特别开朗,他父亲老是笑他为什么总皱着眉头。曹禺的大哥也抽鸦片,父亲无奈之下跪在儿子面前求他不要再抽了。这一幕给曹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。所以,这些氛围和情节,在曹禺的话剧创作中似乎都有所体现。像《雷雨》中周朴园的家长式的威严、不讲情面,像繁漪在周朴园、周萍面前,强忍屈辱,饮恨喝下汤药,这些都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场面,某种程度上,是曹禺自己的生命体验以

及对周围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。曹禺在《北京人》创作谈中,甚至很明确地说:“《北京人》中的曾皓这个人物,就有我父亲的影子”。

遥望那座戏剧的丰碑

曹禺先生纪念日有感

◆ 杨扬

▲ 197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《雷雨》,曹禺(站立者)在剧组讨论剧本



▲ 青年曹禺



▼ 老年曹禺



▼ 2025年濮存昕、唐槐导演的新版《雷雨》



年轻的曹禺何以能连续写出 一系列优秀戏剧作品?

曹禺1910年9月生于天津。1933年暑期,大学四年级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《雷雨》初稿,此时他24岁。1934年7月1日,郑振铎、靳以主编的《文学季刊》第1卷第3期刊发了曹禺的处女作《雷雨》。同年8月,日本学者武田泰淳、竹内好将《文学季刊》带回日本,推荐给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杜宣等,留学生们开始热烈讨论起《雷雨》。12月,浙江的春晖中学演出《雷雨》的片段。《雷雨》真正大获成功是第二年,唐槐秋经营的中国旅行剧团获得了曹禺《雷雨》的上演权后,在京津沪等大城市巡演,《雷雨》轰动一时。此后《雷雨》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长演不衰。

1936年,27岁的曹禺完成了另一部代表作《日出》,从那年6月开始连载在巴金、靳以主编的《文季月刊》上,9月全文载完。距《雷雨》仅相隔三年,曹禺又奉献出了一部话剧力作。1937年4月,靳以、巴金主编的《文丛》第1卷第2期开始连载曹禺的新作《原野》,至第1期第5卷载完。因抗战爆发,受战争影响,曹禺随国立戏剧学校辗转来到四川重庆以及江安等地。1940年3月31日,重庆《国民公报·星期增刊》编发《推荐:国立戏剧学校的〈岳飞〉·〈蜕变〉》专页。4月15日曹禺新创作的话剧《蜕变》,由张骏祥导演,国立戏剧学校首演于重庆国泰大剧场。

院。4月16日《国民公报》开始连载《蜕变》剧本,至6月3日载完。1940年秋,31岁的曹禺在江安开始创作《北京人》。《北京人》1941年5月开始连载于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“文艺”“学生界”,11月1日载完。1942年夏,33岁的曹禺花费了三个月时间,在重庆唐家沱的一艘火轮上,完成根据巴金小说《家》改编的话剧作品。

一般话剧史上,都将曹禺的这几部话剧作品视为曹禺的代表作。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情况看,是曹禺23岁至34岁之间完成的。一个剧作家在青壮年时期,一口气创作出了数部高质量的优秀作品,这样的创造力的持续迸发,实在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奇观。

当然,奇观不奇。如果追踪曹禺的成长历程和创作历程,是不难发现在他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,的确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所难以获得的。除了他早年的家庭生活影响外,他的教育经历也很独特。他所在的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以及清华大学,都是当时中国话剧运动的核心地带。在南开,他不仅遇见了像张彭春这样从美国留学回来,对现代戏剧真正了解、掌握的行家,而且,让少年曹禺有机会随老师学习、创作话剧,登台排戏演出,全方位体验和见习现代戏剧的多方面格式和审美训练;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,大量阅读外国戏剧,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和易卜生戏剧。

进入清华大学后,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是耶鲁大学戏剧专业的毕业生,每年都定期为清华购入大量原版外国戏剧资料,让他的学生们有机会阅读和了解国外戏剧的信息。而且清华学生戏剧社团前有李健吾等活跃分子的积极推进,后有像曹禺、张骏祥等积极分子的不断加入,戏剧创作和演艺氛围非常浓,曹禺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以加速成长。

另外就是曹禺与巴金等文友的深厚友谊。从20世纪30年代《文学季刊》发表《雷雨》开始,曹禺的作品基本上都在巴金主办的期刊和出版社出版;而且,巴金每当遇到曹禺,总是给予其创作上的肯定和鼓励,这种文学同仁之间的帮助、提携和激励,大大激发起曹禺的创作热情。再加上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活,让曹禺对社会、人生有更多的体验和思考,他的思想在成熟,他的话剧创作的风格也在慢慢变化,由初期的传奇剧、命运剧,在抗战期间转向带有契诃夫风格的日常生活剧。这种戏剧风格的变化,与其个人经历和看待社会人生的态度的变化,几乎是吻合的。

曹禺与上海之关系

曹禺与上海的关系可谓密切,主要表现在作品在上海出版、上演;与上海文友的互动以及抗战后在上海的短暂生活。

曹禺作品单行本出版几乎都在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。曹禺新完成一部剧,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出一本。这种创作、出版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,体现出巴金对曹禺创作的信任和支持,对曹禺的创作而言,也是一种无声的激励。如《雷雨》单行本的出版,按照体例,有一个序言之类的文本,这其实是要求创作者自己梳理既有的创作思路。曹禺在《〈雷雨〉跋》中,用了近七千字的篇幅,清理了自己的创作思路,并且针对当时对《雷雨》的评论,集中就一位作家接受其他作家作品的影响

以及个人独创的问题,做了回答。这一答复,在理论上将中国现代戏剧的探索,从社会问题剧推向了诗剧范畴的思考。

曹禺在上海有很多朋友,导演黄佐临就是相处终生的挚友。1929年南开新剧团为庆祝25周年校庆,将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作改译为《争强》,曹禺参加了演出。曹禺的演出非常成功,刚刚从英国伯明翰留学回国的黄佐临观后,写了《南开公演〈争强〉与原著之比较》发表在天津的《大公报》上。这是黄佐临发表的第一篇剧评。黄佐临晚年接受访谈时说:曹禺“演《争强》给我的印象是很有精气神,眼睛发亮,在场上很活跃。”1940年黄佐临离开江安,经过天津,到上海寻求事业发展,手里拿的是曹禺写给李健吾的推荐信。1941年9月,黄佐临、吴仞之、石挥、张伐等脱离上海剧艺社,另组织了上海职业剧团。10月黄佐临担任导演,在卡尔登首演了曹禺的新作《蜕变》。以后黄佐临还执导过曹禺的《家》以及曹禺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1947年,从美国回来的曹禺,一度寄宿在黄佐临家里。

上海戏剧舞台演出曹禺的话剧作品,从20世纪30年代上演《雷雨》开始,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,从未间断。通过上海戏剧舞台上演出曹禺话剧作品这一历史线索,可以见证近百年来上海话剧演艺历史的巨大变迁,同时也看到曹禺话剧作品在一代又一代的话剧人手里,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2024年,上海戏剧学院上演了濮存昕导演的曹禺话剧《雷雨》,它不仅考验了剧作本身在今天演出市场的影响力,同时也体现了艺术院校如何通过《雷雨》的舞台演出,来检验平时对青年戏剧人才在表演训练上的教学效果。

曹禺先生在抗战胜利之后,于1946年3月5日,同老舍先生一起,经上海坐美国的史葛将军号赴美讲学。1947年1月回到上海,暂住在黄佐临先生家。当时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校长的熊佛西先生亲自登门拜访,聘请曹禺担任教授,曹禺接受了熊校长的聘书。因为经济困难,曹禺这一时期接受黄佐临先生的推荐,到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剧,他为文华影业公司创作了电影《艳阳天》,这部被熊佛西先生称为曹禺“电影处女作”的单行本,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5月出版。

曹禺先生作为社会名流,在上海期间的社会活动十分繁忙,如1947年3月参加了田汉先生五十寿辰集会。8月应救济总署之约,与张骏祥等赴黄浦区视察。1948年4月国际剧协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,5月余上沅、熊佛西、曹禺等31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,6月国际剧协准备在捷克举行代表大会,中国推选余上沅、曹禺和张骏祥为代表出席(后因为经费,只派了余上沅先生出席)。1949年2月8日,受中共地下党安排,曹禺离开上海赴香港,经香港停留后,于2月28日,与叶圣陶、柳亚子、赵超构等坐船北上,通过解放区,于3月18日回到解放了的北京。可以说,新中国建立之初前的一段时间,曹禺是在上海度过的。

后记

新中国成立以后,曹禺先生最重要的工作,是与焦菊隐、欧阳山尊和赵起扬一起,筹划、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。建立国家剧院,是曹禺心目中的一个理想,在艺术上对标的,是斯坦尼和丹钦科创建的莫斯科剧院。

1952年6月12日,北京人艺成立大会举行,曹禺担任院长,此后他的艺术生命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它。

